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是儒家著作吗〔*〕

——兼与李均明等先生商榷

○ 袁 青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34)

〔摘 要〕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的整理者李均明认为《殷高宗问于三寿》是儒家著作,但他所举的例证却并非儒家所独有的思想,而是儒家和黄老学共同的思想。从《殷高宗问于三寿》关于“心”的论述来看,与儒家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同,《殷高宗问于三寿》不可能是儒家著作。从《殷高宗问于三寿》相关字句来看,它也不太可能是成书于春秋末期之前而构成儒道共同的思想资源。《殷高宗问于三寿》中充满恐惧的情绪,这一点近于《老子》,而且《殷高宗问于三寿》具有从天道到人道、从养生到治国、因循等黄老学独特的思想特征,表明《殷高宗问于三寿》当是黄老学著作。

〔关键词〕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儒家;黄老;道家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8.011

清华简第五册中有一篇命名为《殷高宗问于三寿》的简文^{〔1〕},该文的整理者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的李均明教授,他认为该篇文献是儒家著作。对这一论断,笔者颇为怀疑,在反驳其论断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该篇当属黄老学著作。

一、《殷高宗问于三寿》学派归属的研究现状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主要以殷高宗与彭祖的对话形式来阐述其思想观念,全文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解释何谓“长”“险”“厌”“恶”;第

作者简介:袁青,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哲学。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黄老道家思想史”(16ZDA10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7YJC720035)、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A-9103-16-065007)的阶段性成果。

二部分主要阐述“祥”“义”“德”“音”“仁”“圣”“智”“利”“信”九个范畴的含义；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人性具有“阳”与“晦”两个方面。关于此文，整理者李均明已经作了多篇文章对其进行研究^[2]，关于此篇的学派归属，他的一个基本论断就是：“本篇作者提出的思想观念主要承自儒家，但亦汲取其他学派的思想要素，具有战国中期思想的特色，与后来荀子的思想已颇相似。”^[3]李均明认为《殷高宗问于三寿》为儒家著作，思想近于荀子。

但是也有学者对于李均明的论断提出异议，曹峰就指出此篇思想面貌非常驳杂：其一，它有与道家接近的戒惧谨慎、居安思危的思想倾向和正言反说的辩证思维；其二，其中“神”“民”并举，又强调“利”，似乎近于墨家，但它没有显示出宗教信仰意义上的鬼神决定论，“利”也似乎指向君臣上下关系，因此又与墨家有距离；其三，“德”“仁”“圣”等似乎是儒家提倡的，但这九大理念中“祥”“义”排第一，这九种理念在儒家经典中没有出现过，似乎又与儒家有距离；其四，此篇关于人性的论述，与孟子性善、荀子性恶有所距离。曹峰认为《殷高宗问于三寿》可能成书于儒道产生之前，没有明确的立场区分，而构成儒道思想的资源。^[4]

要之，在关于《殷高宗问于三寿》的学派归属问题上，李均明认为是儒家著作，思想近于荀子，曹峰认为其没有明确的立场区分，可能儒道思想都从中汲取了一些资源。两位先生关于《殷高宗问于三寿》学派归属问题的论述，不仅涉及其学派归属本身，而且还涉及其成书时代，李均明认为其成书于战国中期，曹峰认为其成书于先秦诸子产生之前。

二、“殷高宗问于三寿”儒家说”之质疑

如前所述，李均明认为《殷高宗问于三寿》为儒家著作，与荀子思想相似，他又专门作了三文，着重比较了《殷高宗问于三寿》的“利”说、“音”说、“中道”观与孔、孟、荀思想的异同，其中关于“利”说的比较，他特别指出《殷高宗问于三寿》的思想观念与孔孟有异，但与荀子思想吻合。^[5]但仔细考察一下，李均明所列举的“利”“音”“中道”等均非儒家独有的思想，黄老学也有类似思想。

《殷高宗问于三寿》关于“利”的定义是：“内基而外比，上下毋攘，左右毋比，强并纠出，经纬顺齐，妒怨毋作，而天目毋眯，是名曰利。”^[6]“内基外比”，即以内为本而以外为辅，李均明认为这是指就义利关系而言，表明义为控制行为的主要因素，而利居于辅助位置。^[7]但他并没有说明为何此处的“内”指“义”而“外”指“利”，从后文“上下”“左右”的描述来看，此处的“利”是有关治国的，此处的“内”“外”更有可能是治国上的内政与外政而并非“义”与“利”。《经法·四度》说：“顺治其内，逆用于外，功成而伤。逆治其内，顺用其外，功成而亡。内外皆逆，是谓重殃，身危为戮，国危破亡。内外皆顺，功成而不废，后不逢殃。”^[8]只重视内政而不重视外政的后果是“功成而伤”，只注重外政而不注重内政的后果是“功成而亡”，说明内政比外政更为根本，但两者需要并重，“内外皆顺”即“内基外比”。“上下毋攘，左右毋比”即说上下不乱，臣子不结党营私，李均明举出《论语》《孟

子》《荀子》等书来证明这与儒家相通^[9]，但这并非儒家独有的思想，黄老学也有类似观点，如《经法·道法》说：“贵贱恒位。”《经法·国次》说：“毋党别”“强并纠出，经纬顺齐，妒怨毋作”等几句即说开源节流、治理顺当整齐、民众心态平和，“天目毋眯”难以理解，李均明认为大抵指对“利”的理解大体清楚，李均明认为这几句也是与儒家思想相通。^[10]但这也不是儒家独特的思想，黄老学也有类似观点，《经法·君正》说：“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又说：“【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治之安。”“知地宜，须时而树”即开源，“节民力”“赋敛有度”“省苛事”“毋夺民时”即节流，“治之安”即“经纬顺齐”。《十六经·顺道》说：“不为怨媒。”这也是“妒怨毋作”的同义词。由此可见，《殷高宗问于三寿》中关于“利”的定义并不具有明显的学派属性，至少儒家和黄老学都有类似思想，因此不能据此认为《殷高宗问于三寿》的“思想观念主要承自儒家”。

《殷高宗问于三寿》关于“音”的定义是：“惠民由任，徇句遏淫，宣仪和乐，非坏于湛，四方劝教，滥媚莫感，是名曰音。”李均明认为，这句话主要阐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主张积极的音乐教育，通过音乐潜移默化的作用，引导人们适度怡乐，抵制邪淫，使感情欲望符合礼仪的方向发展，以达致社会和谐的效果，其与《荀子·乐论》有共同之处，当为《荀子·乐论》产生的前奏。^[11]但是主张积极的乐教的却并非只有儒家，黄老学也有相似的观点，《管子·心术下》说：“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乐哀怒。节怒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尹知章注曰：“正平则能保全其生，喜乐哀怒失常，则失其主。乐主和，故能节怒。礼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礼也。外敬则合礼，内静则循察，故能反其性。”^[12]类似的话又见于《管子·内业》，主要是说人之所以不“正平”是由于喜乐哀怒等情欲而导致的，要节制情欲就需要音乐，而音乐也需要以“礼”节之，以此实现内心之静以及外形之敬，最后归于平正。由于“礼”具有社会政治属性，因此“节乐莫若礼”既具有修身养性的意义，还具有社会政治意义。^[13]如此，《殷高宗问于三寿》关于“音”的思想也非儒家尤其是荀子所独有，至少也是儒家和黄老学共通的思想观念。

《殷高宗问于三寿》又有“揆中水衡”一句，李均明认为“揆中水衡”继承了儒家思想尤其是孟子的“权中”的方法发展而来，“揆中”和“权中”都是通过衡量而实现中道，而“水衡”体现达到平衡的效果，且此效果是可以验证的。^[14]“揆中水衡”出自《殷高宗问于三寿》定义“德”的语句：“揆中水衡，不力，时刑罚赦，振若除慝，冒神之福，同民之力，是名曰德。”“时刑罚赦”即刑赦有时，“振若除慝”即举善去恶，^[15]可见此处的“德”主要是指政治之德，“揆中水衡”也并非李均明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儒家中道观，而是指政治之“中”，政治之“中”即公平公正^[16]，但强调政治上的公平公正也非儒家所独有，黄老道家也十分强调政治的公平公正，如帛书和西汉竹书本《老子》就说：“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此处的“中”即公平公正，要求圣人治国持守公正。^[17]《经法·道法》也说：“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又说：“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这也都是强

调统治者治国需要持守公平公正。因此,仅凭“揆中水衡”一词也不能断定它就是承自儒家的中道观念。

总而言之,李均明所举出的“利”说、“音”说、“揆中水衡”等,并不能说明《殷高宗问于三寿》就是儒家著作,因为这些观念都是儒家和黄老道家所共有的观念,因此,李均明所认为的《殷高宗问于三寿》“主要承自儒家”“与荀子相似”的观点稍嫌武断。

三、《殷高宗问于三寿》当为黄老学著作

有鉴于“《殷高宗问于三寿》儒家说”的不可信,曹峰认为它有可能成书较早,是儒道思想的共同资源。如果按照曹峰的观点,《殷高宗问于三寿》是儒道思想的共同资源,那么它的成书当在诸子百家产生之前,也即春秋末期(老子、孔子)之前。但仔细考察一下《殷高宗问于三寿》,我们却很难认同它成书较早的观点。首先,《殷高宗问于三寿》主要记载商汤与彭祖的对话,据学者的研究,彭祖的故事最早见于《国语》《庄子》《荀子》和《天问》等战国典籍,《论语·述而》中的“窃比于老彭”的“老彭”并非彭祖而是商之贤大夫。^[18]彭祖的故事最早见于战国,因此《殷高宗问于三寿》不太可能成书于春秋末期前,而应当是战国著作。其次,《殷高宗问于三寿》中有许多双音词预示着其成书时代,如“八纪”“教训”等词,其中“八纪”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天有八纪”,“教训”一词最早见于《管子》《晏子春秋》《亢仓子》等子书中,而《黄帝内经》《管子》《晏子春秋》《亢仓子》等书都不会早于战国时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殷高宗问于三寿》的成书时代应当也不会早于战国时代。综合考虑这两点,我们有理由相信《殷高宗问于三寿》当成书于战国时期。

既然《殷高宗问于三寿》成书于战国时期,在诸子分立的时代它当有一定的学术倾向。仔细考察《殷高宗问于三寿》文本,笔者认为其为黄老学著作。

其一,《殷高宗问于三寿》在讨论“何谓险”时说:“夫险莫险于心。”李均明引用《庄子·列御寇》以及《荀子·解蔽》来加以说明,认为其同于儒家思想,^[19]殊不知这刚好暴露出《殷高宗问于三寿》与儒家的分歧之处。《庄子·列御寇》说:“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荀子·解蔽》曰:“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庄子》一书多寓言,其中所载孔子之语本不可信,否则孔子和颜回等都成了道家人物。最关键的在于《荀子·解蔽》,初看起来,“人心之危”与“莫险于心”有相通之处,但早有学者指出《荀子·解蔽》“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与《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差异,《伪古文尚书》中的“危”是危殆之义,而《荀子》中的“危”不能当作危殆讲,而是戒惧之义,并引唐人杨倞注加以论证,杨倞注曰:“危谓不自安,戒惧之谓也。”^[20]如此,则《荀子》所引“人心之危”与《殷高宗问于三寿》“莫险于心”说的并不是一回事,而且据梁涛的研究,《荀子》中的“心”与“性”相对,“性”代表向下堕落的力量,而“心”代表向上提升的力量,性恶心善才是荀子人性论的完整表达。^[21]孟子的

心先天具有四端，更是本然就是善的。因此可以说儒家对于“心”的总体认识是善的，《殷高宗问于三寿》“夫险莫险于心”显然与此恰好是矛盾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殷高宗问于三寿》不能归于儒家。

其二，《殷高宗问于三寿》第一部分记载殷高宗问少寿、中寿、彭祖等三寿“人何谓长？何谓险？何谓厌？何谓恶？”，其中限定了主语是“人”，是探求人如何保持长久、自足，而三寿都是寿命长久之人，尤其是彭祖更是以高寿、善于养生闻名，因此三寿的回答主要是关于人如何保持长久之义，如彭祖回答说：“吾闻夫长莫长于水，吾闻夫险莫险于鬼，厌必平，恶必倾。”其中“鬼”当指“心之鬼”，即心之迷失。^[22]即说人要像水一样保持长久，就要去除心之鬼并且做到自足。因此三寿的回答主要指向的是养生之道。《殷高宗问于三寿》记载在殷高宗听完三寿的回答后说：“吾闻夫长莫长于□，吾闻夫险必矛及干，厌必富，恶必无飶。苟我与尔相念相谋，世世至于后嗣。我思天风，既回或止，吾勉自抑畏以敬，夫兹□。”虽然这段话有阙文，但大体意思是明确的，高宗主要论述的是如何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使殷商统治能够世代持续下去。因此从三寿的回答过渡到高宗的论述，是典型的从养生到治国的黄老学思维方式。

其三，《殷高宗问于三寿》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何谓长”“何谓险”“何谓厌”“何谓恶”，其最终目的是探求国家长治久安而避免倾覆的因素，李均明认为这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23]这种忧患意识，正如曹峰所说，虽然各家都有，但在道家 and 《易传》中最为突出，不过他关于道家所举例子主要是《老子》中的“知足”思想，稍嫌不贴切。^[24]关于《老子》中的忧患意识，著名汉学家葛瑞汉曾说：“在思想深处，用假名来伪装的弥漫于全书的逃避与退隐，是一种主导型的情绪使然，即恐惧。”^[25]《老子》全书中确实由一种“恐惧”情绪主导着，惟其如此，老子才主要关心国家和个人如何求生存，如何做到“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殷高宗问于三寿》记载在听完三寿关于“长”“险”“厌”“恶”的论述后高宗的表现：“高宗恐惧，乃复语彭祖曰：‘呜呼，彭祖！古民人迷乱，象茂康懋，而不知邦之将丧。’”其中直接出现“高宗恐惧”的字样，与《老子》恐惧情绪是相通的。《易传》也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但很多学者都承认《易传》受了老子的影响，甚至认为《易传》为道家著作。^[26]因此，从其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恐惧”情绪来看，《殷高宗问于三寿》可能最近于《老子》。

其四，《殷高宗问于三寿》第二部分主要是彭祖向高宗解释“祥”“义”“德”“音”“仁”“圣”“智”“利”“信”九大范畴的含义。这九大范畴，确如曹峰所说，看似有些与儒家概念相关，但实际上无法完全对等，儒家经典中并没有这样的排列。^[27]在这九大范畴中，“祥”“义”最为重要，其中“祥”排在第一位，其含义是：“闻天之常，祗神之明，上昭顺穆而敬民之行。余享献攻，括还妖祥，是名曰祥。”即说“祥”即了解天常，敬畏神明、祖先以及民众。“义”排第二位，其含义是：“迓则文之化，历象天时，往宅毋从，申礼劝规，辅民之化，民劝毋疲，是名曰义。”即说“义”是教导百姓遵循天地法则以及礼法制度，激发百姓自身积极性，这样的“义”

与儒家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这九大范畴中,最为重要的“祥”“义”均与遵循天地法则相关,这也就是说作为人间统治的核心理念的“祥”与“义”均是效法天地的,其中蕴含了一种从天道到人道的黄老学思维方式。至于其中“德”“音”“仁”“圣”“智”“信”看起来与儒家观念相似,强调“利”又似乎与墨家相关,这其实也并不奇怪,正符合黄老学“采儒墨之善”(《论六家要旨》)的特点。

其五,《殷高宗问于三寿》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人性论,《殷高宗问于三寿》认为人性中有阳和晦的两面,阳的一面是不好的而晦的一面是好的:“阳则捩佚无常。”“晦而本由生光。”“晦而本由生光”,曹峰解释为只有通过“晦”才能让常道发出光亮,这种立场与道家“守弱”“守雌”“守黑”的立场有关。^[28]这种尚阴的人性论自然与道家有关,但《殷高宗问于三寿》并不是仅仅为了讲人性论,它讲人性论的目的是为了因循人性而治国,《殷高宗问于三寿》说:“民之有晦,晦而本由生光,则唯小心翼翼,顾复勉祗,闻教训,余敬养,恭神劳民,揆中而象常。束简和慕,补缺而救枉,天顾复之用休,虽阴又明。”由于民性中阴的一面是好的,因此君主统治也要尚阴而不能尚阳,君主统治的尚阴就表现为:“小心翼翼,顾复勉祗,闻教训,余敬养,恭神劳民,揆中而象常。”这体现出一种因循的思想,与黄老学“以因循为用”(《论六家要旨》)的思想是相通的。

综上所述,“《殷高宗问于三寿》儒家说”不可信,李均明所举的例证都是儒家和黄老学共同的思想,而从《殷高宗问于三寿》关于“心”的论述来看,它与儒家思想具有明显的分歧,因此《殷高宗问于三寿》不属于儒家。从《殷高宗问于三寿》中的一些字句来看,它的成书当在战国时期,因此《殷高宗问于三寿》也不太可能成书很早而成为儒道两家共同的思想资源。从《殷高宗问于三寿》的具体论述来看,其中充满着一种恐惧的情绪,这与《老子》是一致的,并且《殷高宗问于三寿》也具有从天道到人道、从养生到治国、因循等黄老学独特的思想特点,因此,我们认为《殷高宗问于三寿》当为黄老学著作。

注释:

[1][3][6][15]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49—161、149、151、156页。以下所引《殷高宗问于三寿》原文,均引自此书,为书写方便,径直以通行字写出。

[2] 李均明:《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概述》,《文物》2014年第12期;李均明:《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利”说解析——与荀子义利观的比较》,《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李均明:《清华简〈三寿〉音说解析——与〈荀子·乐论〉的比较》,载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六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201—206页;李均明:《揆中水衡——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之中道观》,载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七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37—144页;李均明:《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所反映的忧患意识》,《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

[4][24][28] 曹峰:《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上下两部分简文的研究》,载日本出土资料学会编:《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20号,2016年第7期。

[5] 李均明:《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利”说解析——与荀子义利观的比较》,《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李均明:《清华简〈三寿〉音说解析——与〈荀子·乐论〉的比较》,载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六

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201—206页。李均明：《揆中水衡——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之中道观》，载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七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37—144页。

[7][9][10]李均明：《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利”说解析——与荀子义利观的比较》，《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

[8]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5页。以下所引《黄帝四经》原文，均引自此书，为书写方便，径直以通行字写出。

[11]李均明：《清华简〈三寿〉音说解析——与〈荀子·乐论〉的比较》，载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六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201—206页。

[12]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史学三书平议》，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5页。

[13]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修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237页。

[14]李均明：《揆中水衡——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之中道观》，载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七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37—144页。

[16]公平公正为“中”字应有之义，如《周礼·秋官·司刺》说：“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孔颖达疏曰：“云‘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者，谓上三刺、三宥、三赦若不以此法，恐有滥入者，由用三法，故断民得中。”由此看来，《周礼》所说的“断民中”指的就是司法公平公正。曹峰也认为这句话中的“中”当释为公平公正，参见曹峰：《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上下两部分简文的研究》，载日本出土资料学会编：《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20号，2016年第七期。

[17]袁青：《简帛〈老子〉“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考释》，《中州学刊》2016年第12期。

[18]汪燕岗：《彭祖考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9]李均明：《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概述》，《文物》2014年第12期。

[20]戴君仁：《‘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申义》，《大陆杂志》1970年第3期。

[21]梁涛：《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

[22][27]曹峰：《清华简〈三寿〉〈汤在啻门〉二文中的鬼神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23]李均明：《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所反映的忧患意识》，《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

[25][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54页。

[26]袁青：《“道家主干说”述评》，《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

〔责任编辑：刘 鏊〕